

文字与文化丛书(五)

# 中国语言学 发展方向

袁晓园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 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

袁晓园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印刷

1092×787毫米 32开本 印张10.8 250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500册 定价4.80元

ISBN 7—80014—480—1

---

G·124

# 目 录

|                        |                 |
|------------------------|-----------------|
| 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综述·····    | 东 海 ( 1 )       |
| 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 申小龙 ( 5 )       |
| 语言的全息性与语言的全方位研究·····   | 眸 子 ( 15 )      |
|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全息胚”·····     | 李升召 ( 24 )      |
| 近年来古汉语研究生学位论文述评·····   | 陈海洋 ( 31 )      |
| 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方向·····       | 冯 蒸 ( 45 )      |
| 古音学始末·····             | 朱晓农 ( 58 )      |
| 论汉语语法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 邵敬敏 ( 91 )      |
| 汉语意合语法论纲·····          | 常 理 ( 101 )     |
| 建国以来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反思和创新····· | 洪波、关键 ( 114 )   |
| 传统虚词研究方法局限之检讨·····     | 蓝 鹰 ( 128 )     |
| 语法三疑·····              | 王艾录 ( 136 )     |
| 古文字资料的语法研究述评·····      | 唐钰明 ( 143 )     |
| 近年来国内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         |                 |
| 现状及其向走·····            | 苏新春、顾江萍 ( 159 ) |
| 《说文解字》词义系统研究(提要)·····  | 宋永培 ( 169 )     |
|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   | 蒋冀骋 ( 188 )     |
| 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关系谈·····     | 李运富 ( 197 )     |
| 价值: 由训诂意义再构造想到的·····   | 李亚明 ( 203 )     |
| 应当加强现代汉语词汇学、           |                 |
| 词义学的研究·····            | 谭达人 ( 214 )     |

|                       |             |
|-----------------------|-------------|
| 论训诂学的困惑及其发展.....      | 金戈 (225)    |
| 人文性: 汉语修辞研究的新视角.....  | 王建华 (231)   |
| 试论文字发展基本规律的虚构性.....   | 李葆嘉 (236)   |
| 汉字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 康加深 (251)   |
| 论汉字的形式和内容.....        | 乔晓东 (259)   |
| 汉语羡余现象综论.....         | 韩陈其 (274)   |
| 词序的变换和语义表达.....       | 王晓平 (281)   |
| 平衡心理与汉语特征.....        | 苏宝荣 (290)   |
| 甲骨语言学刍议.....          | 黄发忠 (298)   |
| 汉语语文辞典的编纂与语言研究.....   | 杨崇义 (310)   |
| 语言学理论和语文教学.....       | 卢赓任 (314)   |
| 汉文化与汉语教学.....         | 邓浩、郑捷 (325) |
| 语言学与多学科交叉.....        | 周小冰 (329)   |
| 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论题选登..... | (337)       |
| 后记.....               | (339)       |

# “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综述

东 海

由江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学辞典》编纂委员会筹办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于1987年10月7日至11日在南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44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5家出版社的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70多人。代表的平均年龄35岁左右，最大的不超过45岁，最小的只有23岁。大会收到论文40多篇。

朱德熙先生因病未到，特致信祝贺，称赞“召开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实属创举”，表示支持。致电、致信祝贺的还有汉字现代化研究会、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中国语文》副主编王伯熙、《语文建设》副主编费锦昌、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黄建中及其他一些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江西省副省长陈癸尊、江西师大的领导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德江到会祝贺并提出希望。

大会正式开幕前，组织了一次信息交流会。会上，代表们逐一作了自我介绍，通报了各自的专业方向、近期的研究课题，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杭州、东北、江西等地的青年语言学沙龙的代表通报了各沙龙的活动情况与近期打算。大家都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加强彼此间的亲密合作。

应代表们的要求，研讨会主要以大会发言的形式举行，每人限时10分钟，到时自动（或被“赶”）下台。发言后有质疑者，发言者即席答辩，时间由大会执行主席酌情而定。此外，还安排了两组小组专题讨论：“汉语语法专题”与“汉语词义专题”。前者的特色是自由谈，后者的特色是以介绍、答辩为主，辅之以自由谈。

研讨会的热点主要有：

### 一、中国语言学现状的评估

代表们结合自己熟悉的分支领域的具体情况，针对我国语言学及语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问题、“内耗”、代沟、学风、学派、传统的继承与外来文化的吸收、人才培养、语言学知识的普及等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实事求是的讨论。

普遍认为，从总体上讲，中国语言学的现状是比较地不令人满意的。这主要体现在观念陈旧，方法形而上学，落后、生搬硬套，研究面过窄，内耗太大，语言学与语言学工作者社会地位不高，后继乏人等等。为迅速扭转这种与“四化”要求不相适应的局面，代表们呼吁我国语言学界更新观念，鼓励改革创新，倡导学派公平竞争，拓宽研究领域，充分发挥语言学学科的“领先”功能，鼓励热爱语言学专业的同志出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大力宣传、普及语言学知识，注意梯队建设，正确对待青年后学（特别是正确对待他们的缺点），正确对待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与西方精华的合理吸收，同舟共济，努力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语言学。

### 二、文化语言学

近年来，文化与语言学的关系成了语言学界关心的话题，因而自然也成了本次会议的热点。不少代表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今后我国语言研究的重点，它的兴起是我国语言研究的历史必

然，也代表今后我国语言研究的主流方向。也有的代表认为文化语言学固然值得重视，但不能“包打天下”，而是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鼎足而三，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也有的代表主张文化语言学能被社会语言学所囊括。

### 三、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的不同，取决于对语言本体认识的不同。一些代表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它的人文性，而人文本性决定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人文精神。科学的本质在于实事求是，能揭示语言人文本质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一些代表认为，语言本质的人文性是一回事，采用的研究方法又是一回事。本质的人文性并不能决定方法的人文性。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是科学的、可验证的。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可以而且应当不断深入地分析人文现象的，存在的只有尚未被科学方法分析的人文现象，并不存在科学方法不能分析的人文现象。形式化、量化应是今后语言研究的方向。也有的代表具体地探讨了“系统”的方法、“全息”的方法。总之，较多的代表赞同将各种方法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片面地、绝对地强调某一方法的态度是不妥的。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的科学精神，需要多元的方法论。

### 四、汉语的语义系统问题

许多代表承认，汉语的语义研究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并且也应看到，既是重点，也是难点，需要众多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来通力合作探讨。会上，代表们具体围绕古汉语词义理论、古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展开有益的讨论。

### 五、文字改革问题

一接触到文字改革问题，代表们情绪亢奋，言辞激烈。不少代表认为所谓的“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终成为拼音文

字”这条“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是不存在的，是虚构的。主张对以往的文字改革运动作冷静的深刻的反思。强调我们在看到汉字缺点的同时，更应看到它的优点，更应注意到汉民族之所以长期选择这种文字体制的必然性、合理性。所谓“汉字不便于排版机械化，不便于输入计算机和机器翻译”的说法已不攻自破。每种文字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积淀，因而文字体制的选择不宜用行政手段强行干涉。代表们赞成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也有代表赞成拼音化道路是世界文字的必由之路。还有的代表提出汉字改革的方向可以选择造新形声字。

此外，代表们还具体探讨了语言学、甲骨语言学、儿童语言学、语言教学、汉语研究与民族语研究的结合、方言研究、修辞学、词典学、播音员的语言标准与规范、语法学、古汉语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训诂学、音韵学、语言学与交叉学科、语言哲学等许多饶有兴趣的问题。这一切构成了本次会议绚丽多彩的学术之锦。

# 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申小龙

复旦大学

近年来，我们从中国古代语言传统，汉语的主体意识与文化特征，汉语句子的心理视点及中西语言、语言学的比较等不同角度系统探讨了汉语的句子观和句法观。我们力图“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避免用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从而确立我们对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作句型系统分析的一些基本原则，即：以表达功能为主，辅以构造方式的特点，建立现代汉语的句型系统，以句读段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活动单位，以句读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不同铺排律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格局，以各类句子在汉语交际中的实际运用频率确认其在汉语句型系统中的价值。这些原则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严格地说是体现了汉语句子的常态。

汉语句子的常态问题，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始终未曾提出，更未曾试图加以解决，古人的句读观念是在诵读中神而明之的，于冥冥之中感到汉语的句子有一股“气”。意未尽则气不断，气不断则句未终。自从《马氏文通》模仿西方语法体系建立了“句读论”以后，“欲知句读之所以成，当先知起词、语词之为何”成为语法学界眼中汉语句子的定局。后来的“主谓”二分、六大成分等西方句子理论所以套用的如此自如，都是由于用西方形态语言的句子框架来选择或编造弹性很大的汉语句子事实。毋庸讳言，汉语是有可“主谓”二分的句子，也有可“主

动宾”三分的句子，然而能不能说这就是汉语句子的常态？能不能说建立在这种句子格局之上的分析方法就是汉语析句的金科玉律？汉语语法学界在五十年代就有主宾语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又有句子分析方法的讨论。这两次讨论中一个带有共同性的倾向是试图将传统语法的方法和结构语法的方法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是在汉语语法学旧有的“西化”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趋态，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趋态的先天不足：它所依据的两种句子观都是从西方形态语言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它们在根本上无视汉语句子格局的特点。

我们认为，由于汉民族思维辩证性的特点，由于汉语作为一种非形态语言组合自由的特点，更由于汉语语法的系统分析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语法理论的主导影响，一时难以改变面貌，汉语句法现象的“常态”研究是当务之亟。同时，这一研究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涵义。只有在常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验证前人（包括古人、洋人）所使用的方法，正确评价各种方面的价值，正确理解汉语形式和意义的独特联系，从而探讨汉语句子独立于西方形态语言句子的真实样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句型理论原则和优化方法。

四十年代，何容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法论》中曾经指出：

“自《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文法学，恐怕大部分通则，甚至整个的基础，是用演绎的研究法建立起来的。”“是把欧洲语言里的文法里的通则，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

五十年代，王力先生指出：“有些研究外语的朋友反对我们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以为看不懂，看不惯。这是善意的批评。但是我们也诚恳地告诉这些朋友们，五亿五千万汉族人民完全有权利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而不依傍任何语言的语法体系。有些人说我们标新立异，没有事实根据的标新立异当

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是根据汉语语法特点而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那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新，就是我们所要建立的新的语法体系；异，就是我们将来这个语法体系的汉语语法特点。这个新体系建立了以后，将无往而不利。不象现在我们天天谈汉语特点，天天还是在西洋语法的范围内兜圈子。必须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然后不至于被压在五行山下。”<sup>①</sup>

张世禄先生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提得更尖锐。他认为：“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他列举在词类、结构形式、句子类型这三方面的洋框框，指出它们“好象是三条绳索，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型的方向发展。”<sup>②</sup>

为什么这些前辈一致反对用西洋语言理论做研究基础呢？陈望道先生的一段话说得很深刻：“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sup>③</sup>张志公先生近年也指出：“我们的语法学至今很不成熟，主要缺点是不完全符合汉语特点，或者说，基本上不符合汉语特点。”<sup>④</sup>“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者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sup>⑤</sup>

这些“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的论述是发人深思

的。语言作为人类的基本特性和基本活动，固然有其普遍性，但“言语这种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社会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sup>⑥</sup>语言与民族特性和文化差异有着天然的纽带。语言作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它的规律的发现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由某些民族（如西方民族）的学者从他们民族的语言事实中概括出普遍规律来。近年来因对西方语言学形式主义规范的反思而兴起的广泛的功能主义思潮（Functionalism）也认为，只有在对世界语言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讨论真正的语言普遍现象。

我国现代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是比照拉丁文法体系写成的。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把语言规律的揭示与否提到中西“贤愚优劣”之分的高度，将中西文化放在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贴在以西方文化为顶点的发展系列的某一阶段上，即“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性质上的差异。”<sup>⑦</sup>从中我们不难理解马建忠何以如此虔诚地模仿西方文化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

然而，这种认为人类文明只有一条进化道路，而西方文化则代表和体现了这种进化的最高成就和阶段的单线进化观点，只是近代西方人对其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对外扩张中获得成功的一种难以克服的优越感，它并不是科学的文化观。正如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他著名的《原始思维》一书中所指的那样，尽管人类高级的智力机能不能处处具有某种共同的基础，但仍应该承认人类社会如同有机体一样，可能具有彼此间差异深刻

的结构，从而也在高级智力机能中间具有相应的差异。所以，具有自己的制度和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样式。美国人类学家斯泰华（Julian Steward）也指出，一个文化因其生态协调的不同而依照不同的路线发展，而不是依据一个普遍等同的阶段进行。不少文化人认为中西文化之所以能够比较，就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有共同规律的。这种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显然是简单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和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离开了真实的多样性，不仅无法解释各民族文化的千差万别，而且使得人类文化的统一性也变得不可认识，不可理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基辛在讨论民族文化时指出：“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人类资源。一旦去除了文化间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但可能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与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分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去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绵绵不绝的代价。”可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是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主要内在机制之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对人类来说是根本性的精神价值。而一种价值如果是根本性的，人类对它必然有久远的、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文化中又有大量的独特价值。它是人们在每一不可重复的历史情境中创造出来的，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西方一些学者曾经认为，西欧人最早实现了现代化。他们由此创造出一种最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生活方式。因此现代化就意味着彻底西化。事实上，西方文化在近代传入中国时，其自身已如一个烂熟的果子，开始发生着众多的反叛。二十世纪的东西方文化都在某种自身的异化中向对方的传统汲取灵感，寻求出路。从根本上说，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其

社会机体都需要一些新的特定的机能，而使本民族的传统机制调节、更新，适应这些新机能的需要，比或多或少不加改变地套用西方的体制更为有效。传统本身并不意味着与现代化绝对对立，守旧并非传统固有属性。现代化的许多因素也往往渊源有自，脱胎于传统之中的合理成分。不对现代化的内涵作具体分析，形而上学地将二者对立起来，以为现代化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文化根源、地域种族、各种不同的差异性都消除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观念。

《马氏文通》的“西化”在二、三十年代受到语文学界的激烈批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模仿之风却在种种经过修缮的西方语言理论幌子下继续发展着。即使是提倡“国化”语法的语言学家也往往只是在名词术语上兜圈子，用古名换洋名，“只做了个‘发端’，未曾加以发挥”。似乎离开了他们所竭力反对的《马氏文通》的模仿体系，也就不知所措，唯有回到“对对子”上去。这说明《马氏文通》的“全盘西化”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在其消极意义之外，又带有一种积极的挑战意义。它使处于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冲突之中的中国语文学家再也无法守在虚字研究的安逸的小学“桃源”之中，而必须以文化断裂为契机，寻求传统语文学的更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氏文通》的“西化”又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及其可贵的文化自觉，反映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传统语文现代化的趋势。《马氏文通》系列的著作固然抛弃了传统语文研究中许多精髓的认识，但它为后人提供的语言文化拓展、更新、大发展、再创造的契机则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能正确地把握这一文化断裂的契机，利用这一断裂造成的对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严厉的保守性和排他性的强烈的离心力，就势跳出传统文化的历史窠臼，站在全新的历史高

度和层次，运用现代化科学文化一切新知和新方法，为语言文化传统注入我们这一代理解和判断的新鲜血液，使它不再是面对传统的身外之物，而成为我们继承发展传统的血肉之躯。那么那些在断裂中陷落的传统文化珠玉，不过是文化继承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它是完全可以得到重建和补偿的。然而中国现代语法学是否正确地把握了这一文化断裂的发展契机呢？正如王力所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语言学界，大都是生吞活剥地把外国语言学吸收过来。一些新派语言学家对中国传统语言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以为旧学校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自己在狭窄的范围内钻牛角尖，外国的东西学得不深不透，中国原有的东西知道得更少。而一些旧派语言学家又故步自封，满足于中国原有的成就，即使有所述作，也是陈陈相因，不脱前人的窠臼。这样就不能新旧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sup>⑧</sup>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氏文通》系列著作的失误主要还不在于它制造的断层，或者说它的反传统，而在于它既未能对几百年间中西文化接触中处于震荡之中的传统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又未能树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它置身于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特殊环境，无法在批判而有选择的气度，平静而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结合点，使传统文化通过我们这一代的新的理解，发展出新的生机，新的方向，而是推动着时代的钟摆从中体西用迅速滑向全盘西化，以致《文通》式的文化再造只在形式而不在精神，只在躯壳而不在生命。它使人强烈地感到这种文化改造并非中国传统语文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仅仅是中国的维新派人士在近代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的仓促简单的回应。是败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的一种文化反省和自觉。它缺乏长期而充分的理论准备，正常而健康的运动形态，客观

而冷静的精神素质。《马氏文通》系列的著作撇开传统语文理论中许多根本问题不顾，企图在一个早上依西方的蓝图构建一个全新的“葛郎玛”大厦，正是这种文化鲁莽心态的直接反映。

《马氏文通》宣言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改革。由于它是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充分的形势下的早产儿，它无可避免地除旧有余而布新不足。一代代中国语言学者感念《马氏文通》把中西语言文化的交流推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为传统语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契机，同时又无法排遣因《马氏文通》而造成的对传统文化深刻的误解和由《马氏文通》而错乱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心律。历史的巨大惰性在于尽管人们对《马氏文通》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在模仿和反模仿两端纠缠缠绕，却始终没有勇气和胆识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传统的语文理论进行系统的有意识的现代清理，并据此建立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支撑点，殊不知中国语文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正在于它能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它发生的原因可以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它的最终成就只能是内在的有机的建树，只能是中西文化的有生命的真实融合。这种建树和融合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现代语法学必须彻底摆脱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立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重新认识汉语作为汉民族文化代码的独特的文化性征。充分发掘汉语那种音节纯一性、涵意发散性、组合具象性、铺排条理性的浓郁的人文意识，建立具有汉民族文化通约性的，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和方法。

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具有不同的经验，据此提出和需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因此，没有一个普遍的、中立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或评判语言可以用来评判各种思维模式乃至文化传统的

优劣高下，更不用说把某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标准了。同样，任何一种文化在面临变革、发展的关头，总要有一个对比参照系。而只有将内与外的参照移到未来与传统的参照上面，一种文化才能自觉自愿地走向新生命。汉语和汉语学在近代的命运，预示了中国文化自身内部的危机和裂变。但中国语言文化的本质特点并没有泯灭。外来语文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吞并融合性的古老的巨大文化系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而文化情感方面的剧烈冲突还使它获得了很强的自卫本领，并使某些文化特点扎得更深。事实上，任何一种民族语文传统，无论它多么发达，都只是人类语言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局限和弱点。任何一种语文传统的无限扩张都会给人类语言文化整体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中国现代语文的发展，只有从整体上纳入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长河，才有宏富的前景。当然，西方语言学传统在当代人类语言学中具有其明显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点。但它毕竟只是人类语文的一种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民族语文的视界，东西方语文传统同样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时间序列上的先后，而是语言知解角度上的互补，借鉴和互相渗透。

任何一种语文建设，严格地说又都是一种创造，离开了创造，就没有独立的民族语文。抱残守阙、故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的语文，不论它有多少辉煌的过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前途。而抛弃语文传统，视其为一切危机和问题的罪魁祸首，转而模仿照搬异文化的语文传统，也只会增加建设真正的现代民族语文的困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都是将语文传统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殊不知，中国语文传统本身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面对各种危机和问题时勇敢而又智慧的回答，同样需要在应付新的危机和问